

论曾巩散文的艺术特色及其成因

熊 礼 汇

在散文史上,曾巩地位很高,名在唐宋八大家之列。历来论曾巩者,多将他与欧阳修并提,认为曾文与欧文“皆偏于柔之美”^①。在谈到曾文艺术风格的成因时,也多将其归结为欧阳修对他的影响,甚至有“嫡嗣”之说^②。此说有值得研究的地方,本文拟提出几点看法,以就正于读者。

一

北宋不少人(包括欧阳修、王安石、苏轼等)都说曾文有雄迈奔放的一面,王震即云:“其(指曾巩)文章之鸷鸷奔放、雄浑瑰伟,若三军之朝气、猛兽之抉怒、江湖之波涛、烟云之姿状,一何奇也。”^③。但检曾巩文集,此类散文不多,可能它们多为早年所作,未全保留下来。曾巩现存散文总的风貌是端整、厚实、平正、谨严,来得“柔婉”,其艺术特点具体表现为:

第一,因事作论,征古引经。曾巩作文好议论,除写有大量经论、史论、政论、书论、人物论以外,写其他题材的散文也爱即事论理。曾巩即事论理,有的藉此提出他的政治、思想、学术方面的主张,比如他在《礼阁新仪目录序》就礼制因革议论道:“古今之变不同,而俗之便习亦异,则亦屡变其法以宜之,何必一二以追先王之迹哉!”在《战国策目录序》中说:“盖法者所以适变也,不必尽同;道者所以立本也,不可不一,此理之不易者也。”都是借论古事而谈改革社会的道理。《南齐书目录序》论何谓“良史”,《说苑目录序》谈学者学“道”之难,则是借作书序阐明作者的学术观点。有时,曾巩即事作论是为了批评一种社会风气或一种错误思想。《新书目录序》说汉儒“其弊至于今尚在也”就是批评当时的学风,《梁书目录序》完全是“因梁之事,而为著圣人之所以得及佛之所以失”,是排佛的。这类文章有的是夹叙夹议,有的纯粹是借题发挥。因而曾巩的散文往往以细密的分析揭示出事物的本质,或提出独特的见解,显得理论色彩很浓。

曾巩作论好征古引经,故曾肇称其“言古今治乱得失是非成败、人贤不肖,以至弥纶当世之务,斟酌损益,必本于经”^④,方苞亦云“南丰之文长于道古”^⑤。本来,古文家都爱借用六经语录、古人古事说理,但象曾巩这样大量征古引经以作论的却不多见。其《为人后议》论为人后者应称亲父为皇考,文中提到《礼》及前人释《礼》之书二十四处,直接引用《礼记》及释《礼》之书语录十条,至于用《礼记》大义处更多。《福州上执政书》主意在于要求执政者将作者召回京城或置于近畿,文前讲“先王养士之法”,几乎全用《诗经》有关材料,或引原诗,或概述诗意,或提诗名,共十四处。这都是引经作论。《唐论》论唐太宗“有天下之志,有天下之材,又有治天下之效”,即从“成康歿而民生不见先王之治”说起,接着用秦、汉、晋、隋的不治或治而不足道来反证唐太宗的志高才大、功绩卓越。而在论及太宗“不得与先王并”时,又由

唐虞之治说到汤之治，由汤之治说到文、武之治，再由文、武之治说到太宗为君。通过太宗时代和历代盛世相比说明太宗不如先王。这都是征古作论。当然，曾巩作论更多的是既征古又引经。其《熙宁转对疏》既遍引圣人为例，又“据经之说，以诚意正心修身治国家天下之道必本于学为献”。六经属于儒学的经典著作，在封建社会里，它在理论上的权威性是不容置疑的，引经作论，可以使所论之理建立在“正确”的理论基础上；征古作论不啻使人增加知识，还使人能较深刻地认识现实问题，因而六经和史实是古代论说文的有力论据。曾巩征古引经以作议论，正是利用了经、史作为论据的长处，故曾文论事说理，往往切中事理，显得稳而有深度，无论立论、驳论都有很强的说服力。

第二，藏锋不露，婉曲达意。古文家明理达意，一是畅所欲言，思之所至，倾泻而出。一是藏锋不露，婉曲道来，让读者于言外会之。曾文除《祭王平甫文》、《祭宋龙图文》等篇外，多为后者，说理达意从容和缓，敛锷藏锋，纡徐委婉。《战国策目录序》一文批驳刘向所谓“战国谋士度时君之所能行，不得不然”，认为刘向对战国游说之士的看法是“惑于流俗而不笃于自信”。但他却先肯定刘向对战国时代特点的分析，称赞“其说既美矣”，然后出其“谬论”，可是又不直接说刘向如何惑于流俗而不自信，而是从正面讲孔孟如何守先王之道、因时适变，用游士的“不知道之可信”，“偷为一切之计”与之对照，再用游士亡身灭国之例说明“其为世之大祸明矣”。按一般写法，这里该明点刘向之非了，曾巩却续一句“而俗犹莫之寤也”，这里借对俗莫之寤的感叹来驳刘向，言在彼而意在此，是写得很巧妙的。它能使读者在比较和缓的气氛中逐渐领悟到深刻的道理。

曾巩婉曲达意的手法很多，匡剑帷灯、旁敲侧击便是一种。《送黎安二生序》旨在劝勉黎安二生作古文就要志于古道，苟道不至，文亦难至。但序中并未正面论说，而要二生言外会之。文章因黎安二生学古文、“里之人皆笑以为迂阔”而起，但在写时又把二生的“迂阔”放下，大谈作者的“迂阔”及其“善”与“不善”。篇末又言“遂书以赠二生，并示苏君以为何如也”。显然，作者剖析自己的“迂阔”，正是为了启发黎安二生正确认识他们的“迂阔”，说要征求苏轼的意见，实是启发二生思考作者的观点。《送李材叔知柳州序》勉励李材叔到柳州做官不要因为柳州偏远而不愿在那里长期干下去，也是从议论他人的言论、行动入手。自古以来，一般为官者都认为柳州偏远，不愿在那里为民分忧，作者批评这种现象，极力称美能反其道而行之者，实是婉转地对李材叔提出希望。

曾巩婉曲达意的另一种手法是反复驰骋，说尽事理。《书魏郑公传》即就魏征要将臣下谏诤事交付史官而被太宗所疏远事反复议论，以称魏征之贤。文章先从“君之使臣与臣之事君”的原则说起，说要体现这一原则就不能“灭人言以揜己过，取小亮以私其君”，而拒绝将谏诤事付史官，就是以谏诤为当揜，“以谏诤为非美”。曾巩指出，如果前代之君有纳谏之美而不得传，后世之君就会认为前代无谏诤之事，就会产生“怠”与“忌”，接着又举伊尹、周公和太甲、成王为例，说明后人知前者为贤臣，后者为贤君，是因为伊、周切谏其君的事载于史籍。如果“当时削而弃之”，那后人就不可能知道他们的贤良。作者还指出历史上也有谏诤不传的情况，桀、幽、厉、始皇之亡，其臣之谏词就未留下来，但那“非其史之遗，乃天下不敢言而然也”。这种不传只不过是“益暴其恶于后世而已”。接着又驳斥以谏诤事入史违背“为尊亲贤者讳”的观点，说明《春秋》所讳是恶事而纳谏并非恶事。三次作论，都围绕谏诤事宜付史官的论点展开，道理说得充分实在，归有光曾因此“挟册朗诵至五十余过，……沈吟讽咏”^⑥。曾巩行文注意一层一层、一段一段地说清，大段论述过后，总在段末用几句提纲挈领的话加以收束。

曾巩还习惯于用疑问句、感叹句婉曲达意。本是一种肯定的意见，却用不定语气或疑问语气说出来，有时则使用感叹语气，以慨叹情绪感染读者，显得情韵悠扬。《墨池记》劝勉学者不仅要在学习书法上下功夫，更要把道德修养放在重要地位，可谓曾文中以问句、叹句达意的代表作。如云：“羲之之书晚乃善，则其所能，盖亦以精力同致者，非天成也。然后世未有能及者，岂其学不如彼邪？则学固岂可以少哉！况欲深造道德者邪？”前一疑问句和中间感叹句都肯定后天学习的重要，但语气不同，前者似有商量口气，后者则有强调意思。最后的疑问句则巧妙地地点出主题。曾巩还善于用语助词婉曲达意。《国体辨》用“欤”字十二处，用“也”字三十四处，《邪正辨》用“也”字五十二处，《治之难》用“也”字十五处，都是典型例子。用问句、叹句形式和借助语气词舒缓文气、婉曲达意，能使文章平顺自然，情韵不匮。

第三，叙事周密，翔实明白。曾巩把修史书、特别是作典志的方法用到记叙文中，除讲究真实性外，尤其偏重于记述事物的发展变化过程；善于利用细节和数据一类材料，做到委曲纤细，无不具备。《越州赵公救灾记》就很象现在的调查报告。它记述的是熙宁八年吴越大旱时，越州知州赵抃所采用的救灾措施，目的是给后来者提供治理荒政的经验。它先记赵抃调查灾情的基本情况，再记具体救灾措施，然后写救灾效果。写调查情况，文章把赵抃“调查提纲”的内容几乎全写了出来；记救灾措施，具体写到有灾民若干、所得粮食若干、人平分粮若干、发粮处若干。还写到筹粮、让灾民筑城以得佣钱、对付传染病措施等等，写得周密细致、翔实明白。《越州鉴湖图序》、《广德湖记》讲治湖的优越性和可行性也是援引古今大量材料。用翔实的材料记事，便于说清事情的来龙去脉，有助于读者了解事情的特点。由于用事实说话，还能突出所叙之事的真实性，增强文章的说服力。

曾巩叙事翔实明白的特点也反映在其他类型的散文中。他的论说文就多用材料作为佐证，再参以经史，出以议论。写景也形容尽致，如《道山亭记》描写闽中道路的艰险，便是“穷形尽相，毫发不谬”^⑦。写人也爱用典型材料，通过细节描写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。《与孙司封书》写孔宗旦的洞察形势和切谏精神、忠勇之概，《杂识》写狄青胸有韬略的大将风度和按原则办事的严正态度，《秃秃记》写小儿秃秃的可怜、孙齐的凶狠无耻、周氏的不甘受欺凌、杜氏的逆来顺受以及娼妇陈氏的愚昧狠毒，皆以细节反映出来。

第四，构思入微，精于布置。曾巩作文于构思、章法、句法都很讲究，所谓“字字有法度，无遗憾矣”^⑧，故从前学古文者多从学曾文入手^⑨。

曾巩构思文章，重视立意的新颖，深忌人云亦云。《抚州颜鲁公祠堂记》即就颜真卿“历忤大奸，颠跌撼顿至于七八而终始不以死生祸福为秋毫顾虑，非笃于道者不能如此”立论，而对他抗安禄山之大节只简略言之，从另一角度突出了人物的忠烈节操，显得很有新意。他作书序也不受原书、原序局限，而能独抒己见。刘向作《列女传》，意在劝戒天子整顿内室，使之能得内助以佐王政。曾巩作《列女传目录序》，则提出“内”之能助，关键在于“躬化”，即君王、士大夫要为内室作出表率。他尖锐地指出：“自学问之士，多徇于外物而不安其守，其家室既不见可法，故竞于邪侈”，“士之苟于自恕，顾利冒耻而不知反己者，往往以家累故也。故曰：身不行道，不行于妻子，信哉！”曾巩将“内”之不贤归咎于士大夫行径的丑恶，进而对君王、士大夫的为人提出严格要求，显然比刘向之论深刻得多、全面得多。

朱熹说：“退之、南丰之文却是布置。”^⑩所谓“布置”，指的是对材料的剪裁、安排，章节的勾连、照应等。在这方面，曾巩可谓匠心独运。《寄欧阳舍人书》是感谢欧阳修为其祖父写墓碑铭的。此文的成功和作者对文章结构的精心布置很有关系，文章开篇即大谈铭志与史传意义相近的道理，继而说到后世铭志“不实”、传之益少，盖因“托之非人、书之非公与是故

也”。因而碑志欲传，就须托之得人。这番议论实已从侧面落到欧阳修身上。什么样的人能“尽公与是”？言“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”，再谈到这样的人难遇难得，然后才提出欧阳修，盛赞他的道德文章“固所谓数百年而有者”，而其先祖“幸遇而得铭”，“其传世行后无疑”。文章由远而近，通过议论他事他理而使作者对欧公的颂扬之意、感激之情流溢而出，一点也不做作。而他称美欧公的“公与是”，言其所作有“警劝”之功，又无一不是在为称颂其祖父着力。

曾文句法较活，长句短句骈句散句兼而有之，此外还常用排比句式强调、突出一种感受，显得语句流转活泼。曾巩说理抒情还习惯于用顶真手法使文章语意密、气势盛、结构紧。其利弊如朱熹所说，乃是“一字挨一字，谨严，然太迫”^⑪。

二

曾文艺术特色的形成，有着多方面的原因。

首先是和当时的学风、文风有关。曾巩的青少年时代是在宋仁宗明道、景祐、宝元、庆历年间度过的。这时期文学界的重大变化是古文兴盛，时文（即“昆体”）消歇，而古文的兴盛又与思想界经学兴盛相关。古文家抨击昆体作家“剽剥圣人之经，破碎圣人之言，离析圣人之意，蠹伤圣人之道”^⑫，追求的是能忠实表现儒道的散文。范仲淹分析当时学风、文风之弊就将其归结为“学者不根乎经籍，从政罕议乎教化，故文章柔靡，风俗巧伪”^⑬，言“今士林之间患不稽古，委先王之典，宗权世之文，词多纤秽，士惟偷浅”^⑭。提出“育才之方莫先劝学，劝学之要莫尚宗经”^⑮，要求所举之士“能熟经籍之大义，知王霸之要略”^⑯。倡导经学、改革文风是为推行庆历新政作准备，新政内容之一就是兴学校、尚经术，科举考试还规定“进士先策论，后诗赋，诸科取兼通经义者”^⑰。自然，新政的推行又为普及经学和为古文“宗经”、“稽古”起了促进作用。

这种时代风尚对曾巩的学风、文风以至为人都深有影响。他自言“十六七时，闚六经之言与古今文章有过人者，则于是锐意欲与之并”^⑱，又说“家世业儒，故不业他。自幼逮长，努力文字间，其心之所得庶不凡近，尝自谓于圣人之道有丝发之见焉。周游当世，常斐然有扶衰救缺之心，非徒嗜皮肤、随波流、攀枝叶而已也”^⑲。他推崇欧阳修的“体道扶教”^⑳，向往他的文能载道^㉑。欧阳修对他教诲最多、影响最深的也在于“道”，曾巩尝云：“坐而与之言，未尝不以前古圣人之至德要道可行于当今之世者，使巩薰蒸渐渍，忽不自知其益，而及于中庸之门户，受赐甚大。”^㉒他还曾受教于范仲淹，受影响最大的不外经学、文论两个方面。可以说，曾巩是庆历学风造就出来的学者、散文家，他追求的文体美反映了那个时代文风的特点。

其次，曾文艺术特色的形成与曾巩的文论观点有关。曾巩主张为文须有补于“世教”^㉓，“能讨论古今，润色太平之业”^㉔。强调立论“师经”、“考古”，言“知今者莫若考古，知古者莫若师经。经者，万世之法也”^㉕，还说“今之言古书往往曰迂，然书之事乃已试者也。事已试而施诸治，与时人之自用，孰为得失邪”^㉖。因此要求作家既要“尽心于经”^㉗，又要熟悉“前世当今之得失”^㉘。他认为伟大的作家应该是“畜道德而能文章”，具有“公与是”的写作态度。“畜道德”讲按儒家道德观念治心修身，“能文章”讲具备驾驭语言文字的高超水平。他理想的标准是“工儒学，妙于语言”^㉙。当然，他讲“公与是”离不开封建地主阶级的是非标准，但他强调实话实说却完全对。他还主张叙事析理明白透彻，烦而不乱，用语自然简炼，丽而不浮。为此，他赞赏子夏、左丘明、司马迁、韩愈的“为能叙事，使可行于远”^㉚，批评《南齐

书》的“事迹暧昧”。赞扬李白的“大巧自然，人力何施”^{③①}，推崇欧阳修的“绝去刀尺，浑然天质”^{③②}。他提倡言词美，但要求“气质浑浑，不见刻画”^{③③}。此外，他提倡言约意丰，认为作文章应如《书》，“其体至大，盖一言而尽”^{③④}。从曾巩的散文可以看出，他的文风和他的文论观点是一致的。换言之，曾文的艺术特色正是作者文论观点见诸写作实践的产物。

第三，曾文艺术特色的形成与曾巩着意学刘向、匡衡之文有关。在作人、作文方面，曾巩都受到过欧阳修的影响，所谓“言由公诲，行由公率”^{③⑤}。就文风论，欧文对曾文的最大影响，一是内容上的载道，二是风格上的深沉温厚。两家散文同是来得柔婉，却同中有异。欧文平易，曾文平易而内含古雅；欧文一唱三叹，有风神之美，曾文婉曲，显得敦厚凝重；欧文重言外意，偃仰曲折，耐人咀嚼，曾文反复致意，明白透彻，少有掩蔽；欧文骨朗神清，偏于虚，曾文旁征博引，近于实；欧文以情胜，故温润蕴藉，曾文以理胜，故严整峻洁。欧、曾文体美有差异，有其原因，欧是诗人，故其文多诗意美，曾是学者，故其文学术性强。但这不是主要原因。主要原因是二人达到自然平顺的途径不一样。欧阳修仰慕韩愈，主要是“变退之之奇崛为平易”^{③⑥}，而“能存史迁之神”^{③⑦}。曾巩追求的是西汉中后期散文的文体美，具体说是通过学刘向、匡衡的文风来建立平易自然的风格。故王震说“先生（指曾巩）自负要似刘向，不知韩愈为何如尔”^{③⑧}，刘开也说“子固衍派于匡、刘，皆得力于汉以上者也”^{③⑨}。

汉武帝罢黜百家、独尊儒术，给西汉中后期散文带来两大特点，一是内容上经学气重，二是风格上温柔敦厚。刘向、匡衡是这时期的代表作家，其文“说理之文也，而宗六经”^{④①}，总的风貌是温厚，“得于阴与柔之美”^{④②}。刘向奏疏遍引经文，“一篇文字递递援引许多典故”^{④③}，以“反复致志”，叙事繁简适度，“铺叙有伦，首尾相应”，往往平平说来，娓娓不绝，节奏舒缓，语气温和，“无意为文而能尽意”。匡衡论事亦然，处处引经为证，即使是论及尖锐、严肃的问题，也从远古徐徐道来，慢慢触及时事，显得态度从容，文章凝重平稳。曾巩尚儒，又曾多年校书馆阁，埋首经史之中，其思想、经历以及散文题材多与刘向相近，因而容易接受刘、匡的文风。当然，曾巩并非硬性事仿刘、匡，所谓“刘向老，子固嫩；刘向简，子固烦；刘向枯槁，子固光润耳”。苏辙挽曾巩，赞其“儒术远追齐稷下，文词远比汉京西”，《宋史》本传称其“文学法理，咸精其能，……盖有两汉之风焉”，都道出了曾文和汉文的渊源关系。

第四，曾巩散文艺术特色的形成与他的性情、气质和修养有关。曾巩的性情，曾肇说他“性严谨，而待物坦然，不为疑阻”。他自称“巩非好进而不知止者”，而“性实滞蒙，器非广博，知自强于名节，耻阴附于贵权”，“不知苟曲以取容，但信朴愚而自守”。他又说：“人之性不同，于是知伏闲隐隩，吾性所最宜，驱之就烦，非其器所长，况使之争于势利、爱恶、毁誉之间邪？”曾巩性格温和，偏于柔软，方直谨严而少抗争之心。他于人于事多以忍让为重。如其数次应试不第，受到时人讥议，欧阳修亦为之不平，他却“不非同进，不罪有司，……思广其学而坚守”，对于他人的议论听之任之，说是“吾之不足于义，或爱而举之者，过也；吾之近于义，或爱而毁之者，亦过也，彼何与我哉？此吾所任乎天与人者”。他担任太平州司法参军时，“遇在势者模逆，又议法数不合，常恐不免构陷”，他便“欲求脱去”以避祸，脱去不得，就坐等对方去职，以“自免于祸咎”。

曾巩在政治上也是偏于守成，对于重大斗争更是“虑患防微，绝人远甚”。曾巩是赞成社会改革的，但是行动拘谨。当宋神宗向他征询治国之策时，他只劝神宗多读圣人之书，以求“诚意正心修身治国家天下之道”。他上过许多奏札，但所论之事或是补他人议论之不足，或为细末之事。对于尖锐的政治问题不敢参与斗争。治平年间，朝廷“濮议之争”闹得沸沸扬扬，

曾巩作《为人后议》，主“皇考”说，可写成后秘不示人。欧阳修退休后得见其文，慨叹道：“此吾昔者愿见而不可得者也”。此事后人誉为“未始有所阿附”，实是他敢于争斗的勇气不够。他不赞成王安石的变法措施，但又不象苏轼等人那样坚决反对，当“一时知名士往往坐刺讥语废逐”时，而他“未尝废法自用，以其故莫能中伤”。可见他在政治斗争中也是藏锋不露的。

曾巩临事沉默谨慎，但做事周密细致，编校书籍、处理政务皆是如此。知齐州时，发民治河，县初按籍二丁三丁抽一夫，曾巩括其隐漏，结果九丁出一夫。知洪州时，官军过江西，为防扰民，曾巩预作各种准备，“皆有条理，兵既过而市里不知也”。在知明州时，起初计划修城长二千五百余丈，为门楼十，可用旧砖十分之四。曾巩审订，城减去七十余丈，为门楼二，可用旧砖十分之六。这都表明曾巩处理政事惯于巨细毕举，做得仔细圆满。他的叙事翔实明白当与此相关。

曾巩性情的柔软、温和来自生活的磨炼和对中庸之道的服膺。曾巩成年不久，其父“仕不遂而归”，“无田而食，无屋以居”，他只好“皇皇四方，营饥粥之养”。在二十九岁时，父死。他除赡养继母，还要教养九个妹妹、四个弟弟。他“仆仆东南，有衣食婚嫁之累，拘拘早夜，惟米盐薪水之忧”。而他居然使得九妹皆能及时而嫁，四弟皆中科第，此中辛苦劳苦可以想见。后来他十年校书馆阁，转徙六州为官，生活平静，其性更趋于冲和澹泊。这中间，他以中庸之道为依归的道德修养也起了重要作用。曾巩一生把进入“中庸之域”作为奋斗目标，他讲治“内”主要是用中庸之道来节制性情言行。尝言，“吾窥圣人旨意所出，以去疑解蔽，贤人智者所称事引类，始终之概以广，养吾心以忠，约守而恕行之。其过也改，趋之以勇，而至之以不止，此吾求于内者。”故其为人忠恕孝友，和易质简，“取舍去就必应礼仪”，语默皆合“法度”。既然如此，那么他追求平和、柔婉的文风便势在必然。

三

曾巩作文好征古引经、因事作论，好藏锋不露、婉曲达意，叙事周密、翔实，构思精心入微，无论说理、叙事、抒情都显得自然、平顺、柔婉。曾文的艺术美具备北宋古文的审美特性，合于实用，容易为大家所接受。曾巩散文内容丰富、深刻、章法严谨，平易易懂，这是它的长处。但是，曾文过于讲究稽古、宗经以作议论，因而经学气重。个别篇章简直是经文的义疏，说理近乎迂。由于过于藏锋不露、婉曲达意，便削弱了文章的战斗性。比如他批评佛教的文章，除个别篇章外，皆援引他事他理以论佛，或从“古道”说起，或用称美佛徒的办法来辟佛。婉曲是婉曲，批判的力量却很有限。又由于曾文材料翔实、语意密，加上关联词用得太多，也使得文章不够灵便，故前人说“曾子固木笃而欠玲珑”，“学子固易失之滞”。这些都都不利于激发读者的审美意兴。

曾文艺术特色的形成与当时的学风、文风有关，与范、欧的影响有关，与作者的文论主张有关，与他对刘向、匡衡文体美的执着追求有关，也与他的性情、修养有关。值得指出的是，在这之中，曾巩崇儒、奉行中庸之道所起的作用最大，不但影响到他的性格、政治态度、文论主张、艺术趣味，并和其他因素一起影响到散文的艺术特色。使之既不同于王安石的简劲峭折，也不同于苏轼的俊逸明快，和欧阳修虽然同属平易自然一路，却自有柔婉平实、茂密安和、凝重质直的特点。

注释

- ① 姚鼐《复鲁挈非书》。
② 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。

③、④ 王震《南丰先生文集序》。

④ 曾肇《行状》。

(下转77页)

个世界结为不可分割的一体。

因此在艺术创造过程中,艺术本体并不是如直观唯物主义所理解的那样,仅仅转化为客体,转化为对象,而是同时转化为主体。因而艺术家对于艺术本体世界的开掘,既包括外在的客观世界的开掘,同时也包括内在的客观世界的开掘;艺术家对于客观生活的深入,既包括外在的客观生活的深入,同时也包括内在的客观生活的深入。这两种相反而又相成的开掘和深入,是互为条件、互为前提的,失去对一方的开掘和深入,对另一方的开掘和深入也就难以卓有成效地进行下去。如果只注意外在世界的开掘和深入,就易走向直观唯物主义或客观唯心主义;而只注意内在世界的开掘和深入,则易陷入主观唯心主义。两种开掘和深入的统一,在创造过程中也就是外在尺度和内在尺度的统一、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。

这里似有必要特别指出艺术创造的合规律性问题。合规律性不仅要合乎外在世界的客观规律,同时要合乎内在世界的客观规律。如果仅仅合乎一个方面的规律性,则不能和目的性统一起来。同理,艺术创造中的主观合乎客观,不仅要合乎外在客体的客观性,同时要合乎内在客体的客观性,否则主观就无法实现合乎客观的目的。在上述问题上,我们的理解长期存在片面性。究其原因,在于没有从实践的观点、活动的观点去理解艺术本体,没有将艺术家的实践、活动和存在视为艺术本体世界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。

注释:

- ① 刘纲纪:《书法美学简论》,湖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。第100页。
- ② 马克思: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》,人民出版社1935年版。第81页
- ③ 泰纳:《〈英国文学史〉序言》,转引自《西方文选论》下卷第241页,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。
- ④ 勃兰兑斯:《〈十九世纪文学主流〉第一分册序言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。
- ⑤ 《列宁选集》第2卷第266页。
- ⑥ 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第1卷第16页。
- ⑦ 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第1卷第49—50页。

(上接88页)

- ⑤ 《古文辞类纂·序跋类四》引方苞语。
- ⑥ 钱谦益《题归太仆集》。
- ⑦ 林纾《林氏选评元丰类稿》。
- ⑧ 《童蒙诗训》。
- ⑨ 朱熹即学南丰为文,其《跋曾南丰帖》云:“余年二十许时,便喜读南丰先生之文,而窃慕效之,竟以才力浅短不能遂其所愿。”明代唐宋派、清代桐城派作家学古文亦多从学曾文入手。

⑩⑪ 见《宋代文论选》中“朱熹文论辑录”。

⑫ 石介《怪说中》。

⑬⑭⑮ 范仲淹《上时相议制举书》。

⑯ 范仲淹《上执政书》。

⑰ 《宋史·范仲淹传》。

⑱ 曾巩《学舍记》。

⑲⑳㉑ 见曾巩《上欧阳学士第一书》。

㉒㉓ 曾巩《上欧阳学士第二书》。

㉔ 曾巩《王深父文集序》。

㉕㉖ 曾巩《类要序》。

㉗ 曾巩《杂议·黄河》。

㉘ 曾巩《送赵宏序》。

㉙㉚㉛ 曾巩《王容季文集序》。

㉜ 曾巩《代人祭李太白文》。

㉝㉞ 曾巩《纂欧阳少师文》。

㉟ 曾巩《强几圣文集序》。

㊱ 姚永朴《文学研究法》。

㊲ 王慎中《再与周介生论为文书》。

㊳ 刘开《与阮芸台宫保论文书》。

㊴ 熊玄《与友人论文书》。

㊵ 曾国藩《圣哲画像记》。